

广东省

先模报告团

报告集



4

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委经济工作部 编

省 总 工 会

目 录

林若同志在广东省先进模范事迹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 的讲话(代序)	(1)
--	-------

为民除疟,为国争光

——介绍优秀共产党员、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李国桥同志 及其领导的疟疾研究室的先进事迹	(3)
--	-------

李国桥同志在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 广东省先进模范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	(14)
---	--------

远大理想高尚情操鼓舞我们前进

.....全国先进集体、广东省模范单位广 州卫生处理厂代表、副厂长谭维芳	(17)
---	--------

靠理想导航,用纪律把舵,为祖国争光

.....广州铁路局广九客运段广九二组代表、列车员毕江	(26)
-----------------------------------	--------

为开创广东金矿地质工作新局面贡献力量

.....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广东省地质矿产局 719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工程师许剑超	(35)
---	--------

扎根天涯育新苗

.....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海南黎族苗族 自治州三亚市第二中学教师梁启圣	(46)
--	--------

在反走私的第一线站好岗

.....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九龙海关 查私处海上缉私队艇长曾福增	(57)
--	--------

把全部心血献给法医事业

.....全国三八红旗手、广东省公安厅六处法医陈仲芝 (64)

心中坚定党信念，人生路上永追求

..... 广东省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广州
铁路局韶关工务段退休工程师朱乃宏 (74)

共产主义理想激励我奋发前进

.....大埔县粮食局车队队长刘采来 (84)

林若同志在广东省先进模范事迹 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的讲话

（代序）

（1986年3月7日上午 广州中山纪念堂）

同志们：

刚才，我们听了广东省先进模范事迹报告团中的六位先进模范的事迹报告，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很受教育。这些先进模范事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地表现了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长期工作中，在开放、改革中，在“四化”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表现了可贵的献身精神。在这里，我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向报告团的全体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各地区、各战线都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今天报告的先进模范事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突出的典型。这个报告团除了在省直单位作报告外，还要到各市、地向干部、群众作巡回报告。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人讲献身精神，这是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的。这对于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必将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和

积极效果，这也是我省继续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转变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一个实际步骤。

我省先进模范事迹报告团所介绍的动人事迹和崇高思想，是全省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进行“四有”教育的极好教材。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一报告活动，要通过学习先进模范的事迹，把干部、群众引导到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上来。要学习先进模范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忘我工作、勇于献身的精神；学习他们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他们在改革和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勇于开拓，争作贡献的愚公精神；学习他们拒腐蚀永不沾，克己奉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艰苦奋斗精神。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向先进模范学习，作出表率，以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各部门和各基层单位，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和对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学模范、赶先进、比贡献”，“讲理想、守纪律、做主人”，“向先进模范学习，为振兴中华献身”等丰富多采的活动，推动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为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为民除疟，为国争光

——介绍优秀共产党员、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李国桥同志及其领导的疟疾研究室的先进事迹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疟疾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李国桥，以及他领导的疟疾研究室，寻找抗疟新路，艰苦奋斗十八年的动人事迹。

李国桥今年五十岁，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1955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的前身——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并留校工作，1961年入党。他先后被评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并担任过学院党委副书记。从1979年起，他一直担任学院副院长。他还是全国疟疾专题委员会委员。

李国桥同志为什么会和疟疾结下不解之缘呢？这是有原因的。

疟疾在民间称为“打摆子”，得了这种病后，先是寒战，接着就是高烧，冷起来盖几床棉被也没有用，热起来体温可达四十一度以上，病人十分痛苦。疟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间日疟，一种是恶性疟，对人体危害最大的就是恶性疟，因为恶性疟会引起凶险型疟疾和脑型疟疾而造成死亡。

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疟疾仍然是世界上分布较广，发病率

较高的疾病，是世界六大流行病之一。根据资料报告，每年全世界仍然有两亿人受它的危害。这种病常见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贫穷病”、“落后病”。过去有效的抗疟药氯喹，六十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恶性疟抗药现象，也就是说这种药已经逐渐失效了。

面对这种严重状况，1967年，李国桥同志带着周总理的指示，领着几位同志来到了疟疾高发地海南山区和云南边陲。

在我国的云南，疟疾仍然猖獗。当年他们来到云南疟疾区时，正是疟疾暴发流行时节。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寨里，每家每户都有疟疾病人，有的全家病倒，出现地无人耕，牛无人放，饭无人煮的悲惨情景。他们看到一个原来是四口人的家庭，在短短的八天内，恶性疟就夺去了父子二人的生命，母亲和那两岁的女儿也都患恶性疟病倒了……。耳闻目睹的这些悲惨情景，使他们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他们坚定地表示要立志疟区，为人民群众解除疾苦。

他们在山区工作，交通十分不方便，特别是在云南边疆，总是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而且毒蛇猛兽很多。

在云南边疆的一个深夜，李国桥突然接到阿佤山上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孕妇得了脑型疟昏迷不醒。脑型疟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疾病，而孕妇得了这种病就更容易死亡。李国桥一边在电话里指导当地进行应急治疗，一边迅速做好抢救前的准备。天还没亮，他就领着一位同志乘最早的班车出发了。经过三个小时坎坷山路的颠簸，他们来到阿佤山脚下。阿佤山是云南西南边疆的一座大山，海拔一千多米，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野兽出没。过去他们经过这里都是有武装民兵护送的，这次由于救人心切，走得很匆忙，没找到民兵，自己又没武

器，但是他们一心想着那垂危的病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路上他们只吃了一些白饭，喝了点白糖水，整整走了十六个小时的山路，直到晚上九点，才到达目的地。他们不顾疲劳和饥饿，马上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终于保住了孕妇的生命。

他们就是这样，为了救治病人，在李国桥的带领下，总是哪里有病人，就往哪里去，什么时候有危重病人，就什么时候出诊。究竟爬过多少次高山，走过多少夜路，大家都记不得了。李国桥同志有一次为了解疫情，连续走了整整三天。在疟疾流行的时候，同志们连续出诊，日夜抢救，还要宣传卫生常识，挨家挨户地给群众发预防药。由于得不到休息，大家都很疲劳。那时候，同志们都瘦了许多，瘦得最多的要算李国桥了，他一米七四的个子当时只有四十四公斤。有一次，为了抢救一个脑型疟病人，李国桥和靳瑞老师一连三十六个小时守在病人身旁，没靠一下，没睡一会儿。当病人脱离危险后，李国桥一躺下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醒过来时，全身都麻木了，动弹不得，因为他一夜没有翻过身。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吃的是青菜、萝卜、咸菜，甚至只有白饭，最好也不过加上几片猪肉。1976年以前的十年间，他们住的是茅草房或破木屋。李国桥就住了十年的茅草房和两年的破木屋。住茅草房最可怕的就是有毒蛇爬进来。有一次，李国桥刚躺下，忽然感到有什么冷冰冰的东西爬到身上，他警惕地用手一甩，不禁叫了一声，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条毒蛇。

李国桥同志常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起码的是要有救死扶伤的精神，我们讲的是奉献而不是索取。”他们不仅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有时为了抢救垂危病人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由于疟疾病人发病时会出现大量红血球被疟原

虫破坏而危及生命的情况，这时，最有效的抢救措施就是输血。可是山区没有血库。每当遇上这种情况，他们就主动献血。李国桥是研究室里第一个给病人献血的，献血最多的也是他，他先后为病人献过五次血近一千毫升。在他的影响下，同志们凡是符合献血条件的，关键时刻都献过血，人们都说他们是一支“献血队”、“活血库”。他们以自己宝贵的鲜血，救活了许多垂危的病人。但是当病人家属或群众给他们送来慰问品时，他们总是能谢绝就谢绝，实在没办法的，就转送给其他病人。

李国桥同志不但以自己的鲜血救活自己同胞的生命，还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了一位外国病人的生命，人们称赞他是中国的白求恩。

那是1976年的事了。李国桥同志作为我国一支疟疾防治考察组副组长来到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当时那个国家正值疟疾病全国性的暴发。有一间医院，当时每天至少有二至三人死于疟疾。甚至这里的医务人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八人被疟疾夺去了生命。

李国桥日夜守护在危重病人身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精心治疗下，他们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为了抢救一个垂危的凶险型疟疾病人，他又献了血。这宝贵的血液，这中国人的血液流入了这位外国人的身体，使他得救了。在场的人情不自禁地说：“中国好！中国好！”

人们纷纷赞扬李国桥，说他是块金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

六十年代后期，李国桥同志带领疟疾研究室的同志们，接受了国家交给的用针灸防治疟疾的任务。研究初期，他们觉得

针灸疗法对有免疫的病人疗效较好，但对没有免疫力的病人疗效较差。为了找到疗效较好的穴位，他们不知道在自己身上试过多少次针。一次，李国桥同志请靳瑞老师在他的大椎穴扎针。在他的鼓励下，银针被慢慢地往里推进，插入了七厘米，一直进入到了神经中枢脊髓里面，全身象触了电一样，稍微一动银针，整个人就蹦起来。另外，他还在一些刺激性较强的穴位试针。又有一次扎腰椎一个穴位时，由于产生了副作用，竟使他的左下肢失去了冷的感觉，整整四个月才恢复。靳瑞老师也在自己的腹部一连扎了三十六针。

经过摸索，他们决定更进一步做试验。但是有的危险穴位是不允许在病人身上进行的。怎么办？李国桥同志首先想到了自己，决定使自身先感染上疟疾然后接受针灸治疗。当时大家都不同意，他就瞒着大家，说服了护士小杨给他打针。这是一支很特别的针——是两毫升含有间日疟原虫血液的针。

果然，李国桥打了这支针后十三天开始发病了。而且这次试验要等待出现高烧，形成典型病例以后才进行针灸治疗。摄氏三十八度、三十九度、四十度，体温一天天上升，高烧带来的折磨一天天加剧。四十度的体温一直持续了四天。为了分散注意力，减轻痛苦感觉，他或者唱歌，或者跑步，或者去挖地……这时，正是海南盛暑，人们热得大汗淋漓，李国桥却穿着几件厚衣服。靳瑞老师见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心疼地说：“还是快用药吧！”他强露笑容地说：“不要紧，麻烦你帮我淋淋水。”原来李国桥想尝试一下，在发冷发得难受的情况下，能否用淋热水的方法来减轻痛苦。就这样，一桶一桶的热水浇在他的身上，一边淋，他一边喊：“痛快，好痛快啊！”可是淋完热水穿上衣服，他又照样打起寒战来。看着这种情景，在场的同志

们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体温继续上升，高达摄氏四十一度四！心跳每分钟快达一百四十多次，嘴唇起泡，肝脾肿大，红血球正在急速下降！大家手软了，不忍心再给他扎针了。但是他却鼓励大家“大胆扎吧！”护士小杨看不下去，跑出去痛哭了一场，她真后悔自己给李国桥打了那支特别的针。李国桥同志靠着坚强的意志，顽强地坚持了十一天，直到试验结束为止。

李国桥同志不仅是一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优秀党员，而且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研工作者。他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作风是十分严谨的。按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的话来说，“李国桥的研究，是把临床学和生物学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经过长期的探索，李国桥发现恶性疟原虫每个分裂繁殖周期引起两次发热，而前人认为只引起一次发热。为了验证这一新理论，他们首先用猴子做试验。但猴子不会象人一样发热，只好找健康人来做试验。可是找谁来做呢？实在是不容易找啊，因为这次试验更危险，实际上是人为地造成一次严重的疟疾。这类试验，既要忍受极大的肉体上的痛苦，还要冒一定的风险。李国桥又一次决定由自己承担。研究室的同志们不忍心他去冒这个风险，因为这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由于常年累月奔波劳累，他的体质不太好。而且同志们都知道，首次患恶性疟的人，有些一开始发病就出现昏迷成为脑型疟，而脑型疟又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疾病。李国桥作为行家，对这一切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为了探索解决一个关系到千千万万病人疾苦的课题，就是忍受再大的痛苦，冒再大的风险他也要干。在他一再坚持下，于1981年8月11日深夜两点，在海南疟区把两毫升含有恶性疟原虫的血液注入了李国桥的血管

里。

感染后第四天他返回了广州。因为这种试验在广州才有条件完成。到广州的当天晚上，他开始发热住进了医院。他的助手郭兴伯同志不安地在他的病床边走来走去。可是李国桥却对郭兴伯说：“如果我很快出现昏迷，也不要马上用药，无论如何我们的试验方案不能变，你一定要在我的身上看到两次发热。”郭兴伯知道，昏迷了还不抓紧用特效药是危险的。他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组织交代，怎么对得起培养过他而又和他亲密合作多年的老师和战友呢？李国桥看出了他的心事，就写了一张字条交给他。字条是这样写的，“自身感染是我叫郭兴伯给我做的，如果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也是我叫他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珍秀不要责怪他。李国桥，1981年8月16日。”珍秀就是李国桥同志的爱人。同志们，这不是一般的字条啊！

事后他还多次说过：“如果万一出了意外，请你们别忘了在送给我的花圈上，画上疟原虫环状体标志，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同志们，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字条，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话，它充分显示了优秀共产党员李国桥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英勇献身的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的高贵品德。

第一次发热出现了，李国桥体温高达四十度多，痛苦迅速加剧，高烧、呕吐、剧烈的头痛，痛苦是难以描述的。为了试验的准确性，他只是用冷毛巾敷着头部，坚持不吃退热药，宁愿忍受着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老郭心痛地拿来了特效药，恳切地劝他快吃下去。这种特效药叫青蒿素，是我国发明的新药，吃了这种药痛苦和症状是会逐渐减轻然后消失，但是试验也就半途而

废了。李国桥坚定地摇摇头，拒绝了。当那每立方毫米的血液就有十万个穷凶极恶的疟原虫在他体内发育繁殖、拚命吞噬他的红血球的时候，他却对郭兴伯说：“老郭，你最清楚我目前的状况，千万不能如实地告诉领导和我爱人，不要因此而影响整个试验计划。”李国桥同志就是这样，靠着坚强的意志，靠着对科学的炽热追求，强忍着难以描述的痛苦，使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结果。然而，这次试验后，李国桥同志身体又一次受到了损害。可是当他看到在他身上出现两次热峰的结果时，憔悴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个科学论点的证明，往往需要反复的实践验证。在共产党员李国桥的影响下，郭兴伯也要求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李国桥想到郭兴伯因胃出血手术后不到一年半，体质还较虚弱，不忍心让他再去承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由于郭兴伯再三恳求，李国桥只好怀着感激的心情，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同意了。

他们冒着危险所作的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恶性疟原虫每个裂殖周期引起两次发热的理论，逐渐得到了同行们的接受和较高的评价。我国疟疾研究的老前辈，上海寄生虫研究所任道性教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李国桥他们取得的成果。李国桥他们的这个理论，对恶性疟的诊断、抗疟药的疗效评价以及对脑型疟救治和研究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他们运用这一理论进行诊断和治疗脑型疟，死亡率控制在百分之十以下，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也只是把死亡率控制在百分之十七。他们还运用这一理论对多种抗疟新药进行疗效评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李国桥是学院的领导、学术上的带头人，也是同志们的知

心朋友。他深深地懂得，在工作中，一个集体团结协作的重要。他无微不至地从思想和生活上关心同志们。就拿青年化验员简华香来说吧，每年春节前回家探亲，都要到离学院很远的汽车站去赶搭早上五点半的长途班车。李国桥和郭兴伯想到小简是个大姑娘，很不放心。于是，每年这个时候，他俩就早上四点起床，冒着寒冷，用自行车一个载人，一个载行李从学院护送小简去车站。从小简来到这个集体开始，年年如此。直到1984年小简有了对象，他们这个送人的任务才告完成。

还有一件事，也使研究室的同志久久难忘。那是在1980年，郭兴伯在海南崖县（即现三亚市）胃病复发，胃大出血。李国桥同志得到消息后连夜坐车从东方县赶到崖县，一直守护在老郭身旁。每天天刚亮，李国桥就赶到市场，排队买瘦肉和鸡蛋，亲自煮稀饭端到老郭面前。老郭的病情稳定后，李国桥才挂了一个长途电话给老郭的爱人。他先对老郭的爱人说：“怕你担心，我没有把老郭得病的事及时告诉你，请你原谅。现在，他的身体开始好转了，他就在我身边，请他跟你说几句话吧！”老郭接过话筒，激动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事情虽小，但从细微之处见真情。领导的关怀，温暖着每个人的心；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行为，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十七岁就来到研究室搞化验的小刘说：“研究室的工作虽然很紧张很辛苦，但是这里象自己家里一样温暖，来了就不想回去。在这里生活我感到充实。”小刘说出了同志们的心里话。

李国桥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十八年的忘我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尝遍了甜酸苦辣，终于取得了不平凡的收获。多年来，他们曾经得到国家科委、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嘉奖，受到学院多次表彰。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

上，他们与中医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协作的青蒿素抗疟研究项目，获国家重大科研成果奖，1979年又获国家二等发明奖。今天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蜚声中外，这和李国桥在临床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他们有两篇论文先后在世界著名医药杂志——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其中一篇在头篇作为创新性的研究论文发表。他们还有一篇题为《皮内血片诊断脑型疟的应用》的论文，被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热带医学部列为他们1985年的科研项目。1984年9月，李国桥同志应邀出席了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热带病暨疟疾防治大会，会上又宣读了三篇论文，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和好评。更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在海南东方县东方区，建立了目前我国唯一的抗疟新药临床研究基地，这个初具规模的基地是他们筹集资金办起来的，它凝结着李国桥和同志们的汗水和心血。他们按国家和国际标准开展抗疟新药的临床研究。全国的抗疟新药，绝大多数都拿到研究基地作临床验证，甚至世界有名的瑞士罗氏药厂也把药品送来验证。

这支队伍，能够在十八年中不断发展，攻破一道又一道的科学难关，靠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学院和地方党委的支持，靠的是研究室全体同志对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靠的是李国桥同志的好领导。

也许有人会问，李国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名和利吧？如果是为了名，那么，为什么已经是高等院校副院长、副教授的李国桥，却要到边远山区的荒凉地带去吃苦呢？如果是为了利，那么为什么李国桥带领着大家，在十八年里不知治愈过多少病人，挽回过多少生命，可是他们不但不收钱，而且还主动献血呢？如果说是为了利，那么为什么李国桥和郭兴伯会拿自己的身体作试验？

十八个寒暑，他们不分昼夜，不知节假日，病人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就是李国桥铁的工作时间，他从来没有领过一次加班费；十八个春秋月圆月缺，他只有两个中秋节和家人团聚，每年都领着大家在山区艰苦奋斗七、八个月，即使在广州的几个月，他们也是忙于整理资料或做实验。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民除疟，为国争光”，这就是李国桥同志的追求，这就是研究室同志的心声，这就是他们能在山区艰苦奋斗十八年的精神支柱。

（由广州中医学院教师符林春、张小芸、叶菁介绍）

李国桥同志在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广东省先进模范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

（1986年3月10日上午）

我想说一个问题。最近以来，记者采访、座谈时提出一个问题，我在广州已有工作岗位，为什么能够十八年长期乐意在山区边疆工作。是的，实际上从1972年，我就被任命为当时叫广州中医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那个时候，主任、副主任有七、八个，我已经是第八个了，何必要那么多人呢？而疟区人民又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为他们解除疾苦，所以，我一直坚持在下面工作。在云南边疆，那里疟疾暴发流行的情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些情况，刚才张小芸老师已经介绍了。我有一次到了云南省西南边疆的镇康县，有个大队才三千人，在十月到十二月疟疾流行季节，这个三千人的大队就死了四十人。还有一个公社叫富荣公社，五千多人口，四个月就死了七十几人。我感觉到，疟疾的暴发流行，实际上是向我们从事疟疾防治研究这个专业的人挑战。所以，使我更加下决心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干下去。昨天，我还收到广西一个地区防疫站和卫生局的一封信，说他们那里去年有十多例脑型疟，多数都